

中央大学四年略记

胡业仑

我于 1942 年秋至 1946 年夏在中央大学就读大学本科，共计四年。我是江苏人，抗战前在江苏省读中学，战争爆发后随学校迁至大后方四川。中学毕业后我报考了当时质量和待遇最好的中央大学并有幸被录取。我所在的系是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公民训育系。1942 年秋，新生开始报到上学。我先到中央大学校本部（沙坪县）办理入学注册手续，然后到位于主要为新生开始基础课的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去上课。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公民训育系一年级第一次级会上，我被选为级会总干事。不久，校本部的高年级同学到分校访问欢迎新同学。我系二年级同学刘星权随同政治系二年级同学龙任重来到我系对我进行访问。他们对我系一年级的新同学新伙伴表示热烈欢迎。我在中央大学的经历也就由此开始。下面把我在中大四年耳闻目睹以及亲身经历的若干琐事记述如下：

（一）

不是党员竟然参加党部执行委员竞选

我到中央大学前本来不是国民党党员。龙任重代表中大区国民党党部到柏溪分校来筹建柏溪分校区分部。龙要我参加竞选区分部执委。我说：“我不是国民党党员，怎能参选呢？”龙说：“你就说你在涪阳老家参加过国民党，因长途跋涉来川，党证遗失了。我回去替你补办党证就是了。”就这样，我报名参加了竞选并当选为分校区分部执委。第一次执委会议上选举分校主任唐培经为书记，我负责组织工作。

（二）

尼赫鲁说，中国抗战胜利之日即印度独立之时

1943 年暑假，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在重庆北碚举办大学生夏令营。四川省内各大学学生不管是否团员都可以参加。汉藏教理学院也有好几位西藏学生参加了夏令营。当然参加的学生以中央大学的为最多。夏令营主任是张治中（中央团部书记长），副主任是康泽（中央团部组织处长）。张治中不常在，康泽主持日常事宜。夏令营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总队长为康泽，下设几个区队。我当时被中大学员推选为第一区队长。几位区队长分别轮流值日。一天夜里 12 点左右，我正在值班，康泽来到值班室命令我吹哨子紧急集合。我整好学生的队列后，向康泽报告应到人数、实到人数。这时，主席台上出现蒋中正、何应钦、张治中、尼赫鲁四人。蒋中正先讲话，要我们严格遵守纪律，学习些军事知识，随后他说，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甘地的亲密战友尼赫鲁先生来华访问。接着他请尼赫鲁讲话。尼赫鲁讲话时盛赞中国军民坚决勇敢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无畏精神，他说这非常值得印度人民学习。最后，他说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到底，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而中国抗战胜利之日即印度独立之时。他希望印中两国真诚联合起来，

打倒所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最后他请蒋中正在适当时候访问印度（后来，蒋中正去印度访问并会晤了甘地）。

（三）

外国政府设在中央大学

在中央大学校区松林坡的环山路上，在中大民主墙的右侧挂着一块“韩国临时政府”的木板黑字牌子，牌子不引人注意。我听说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名天山是一位有名的反日爱国运动的坚强志士。但我在抗战胜利及新中国成立后，未闻其人。

（四）

化解一次学生游行

1944年春，我当选为中大学生自治会主席。蒋中正校长在举行纪念周后叫朱经农教育长带我去校长室见他，他问我是学生会主席嘛？我说：“是。”他说：“我交给你一个任务，就是制止学生到重庆游行。重庆是陪都，国际友人很多，游行会影响国际友人的观瞻。”我说：“有时怕制止不了。”他说：“制止不了可以到重庆找我。”有一天晚上，中大理、工、农三院同学在大礼堂开会，打算第二天到重庆游行，要求增加伙食费。原来中大学生每人每月伙食贷金四元伍角，抗战七、八年了，物价有些波动，学生伙食较差是事实。有人到阅览室来找我。我当即到大礼堂向会议主持人（可能是机械系学生邵菊华）打个招呼，说我想讲几句话。主持人说：“欢迎胡主席讲话”。全体人员也鼓掌欢迎。我说：“现在物价有些上涨，我们伙食的确很差，影响了我们身体健康。但是我们也应考虑到国家财政困难，国土大部分被日本鬼子侵占，赋税难收。因此，我们不能要求过高。我想由原来四块半增加到五块半，大家以为如何？”大家齐声说：“你说话不能算数。”我说：“如果大家同意我的意见，明天就不游行，我先到教育部去交涉一下。如果教育部不同意，我回来就发动文、法、师三院同学一起到重庆游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如果教育部同意每人每月增加一元伙食费，那我们安心学习就是了。”大家一致同意我的意见。第二天一早，我到重庆找到蒋中正校长说明情况，蒋校长问：“你的意见呢？”“我的意见每人每月增加一元伙食费。”他同意并写了一张条子给我拿去找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把我送到门外说：“我派车把你送到青木关吧。”我说：“谢谢，我乘公共汽车就可以了。”到了位于青木关的教育部，次长余井塘接见我。我要见陈部长。他说：“有什么事可以对我说，部长主持重要会议，无暇接见你。”我把签有蒋中正名字的条子给余次长看。他随即把陈部长找来同我谈。陈部长说：“等呈报行政院院会通过才能决定是否增加伙食费。这不只是中央大学，牵涉到全国各个大学的事情，不能马上要我决定。”我立刻以中大学生为后盾，态度变得强硬起来，说：“今天不决定，明天我把中大学生带来包围教育部强行要你决定。”陈说：“不能，不能。”又问：“蒋校长对你怎样说的？”我说：“蒋校长同意每人每月增加一块钱伙食费。”他说：“那好，照办。我马上打电话给中大会计室。”我回校后，在学生自治会张贴了一份布告，要求各院学生会主席写好该院同学姓名到会计室领取每人本月伙食费增加的一元钱。下月份就按每人每月五元五角钱由伙食委员会领取。就这样，我化解了一次学生游行。

(五)

帮教授解决吃饭问题

有一次，中央大学教授伙食团煤炭即将烧完，眼看就要断炊。当时煤炭由政府的资源委员会燃料管理处统一管理。学校商请燃料管理处发给教授伙食团煤炭无结果，教授会派人去交涉也无效。教授会主席缪凤林（史地系主任）晚上来到宿舍找我帮忙到重庆要煤炭，他说：“眼看教师就要断炊，没有饭吃就不能上课。”我立即答应明天到燃料管理处要煤。如不给煤，我就把中央大学学生领到燃料管理处去示威（当时政府机构就怕学生示威）。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燃料管理处。该处负责人婉言拒绝给煤，说什么交通运输困难，煤炭很紧缺。中大可以用木柴、茅草等解决燃料问题。我讲：“不必多说，不给煤，明天我把中大学生全部带来把你们燃料管理处砸烂。”该人连说：“不能，不能。我同你去找主任吧。”我们找到资源委员会钱昌照主任委员。钱主任看我来势汹汹，就问那人燃管处究竟有没有煤。那人说有。“那你就装一车由他（指我）带回去”，钱主任说。后来，我坐在驾驶室把一大卡车煤卸在教授伙食团外、付点钱给驾驶员带走时，缪先生翘着大姆指说：“还是你们学生力量大。”

(六)

与美国顾问团赛球

美军顾问团派人持函找我，洽商到中大比赛篮球事宜，要同中大篮球队赛球。我立即回答欢迎他们到中大来打球，并决定了具体日期。然后我找到体育系主任江良规。他很高兴地对我说：“不限于体育系人，别的系有打得好的人也可以参加组成中大篮球队同他们打嘛！”到那天，美军顾问团按时开了一辆军车（约三十人左右）来到中大。比赛开始。上半场美军赢了。休息时，蒋校长来了，他走球场经过，没有人向他敬礼打招呼。他见我说了说：“中大学生没有礼貌。司令官见我都要立正敬礼。”我说：“学生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礼貌差，比较散漫些。”他很不高兴地去找朱经农了。下半场开始，中大球员横冲直撞，把美方一球员（据说是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撞倒，犯规罚球，但最后结果仍以中大队获胜（赢5分）而告结束。

(七)

组织名人讲演

我的上届学生会主席刘兆田（政治系）和我的下届主席金唯信（经济系）都说我担任学生会主席时特别忙，事情也特别多。我不但平常学习时间受到影响，就连星期天也得不到休息。当时，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请名人讲演。

请过冯玉祥副委员长到中大讲全国各战场战斗情况，请过傅作义将军讲绥远省战争形势，请过回国述职的驻苏大使邵力子讲莫斯科会战情况。他说，当时在莫斯科朝天上看，满天铁鸟（指德军几千架飞机轰炸莫斯科），朝地下看，遍地都是爬虫（指德军坦克之多）。当时莫斯科被轰炸得面目全非。苏联政府决定迁都到乌拉尔山以东的古比雪夫。中国大使馆也筹备迁去。当时苏联其他领导人敦请劝说斯大林元帅离开莫斯科到古比雪夫办公，斯大林坚决不肯离开莫斯科。虽然当时的人员死伤、财物损失很严重，最后德军没有占领莫斯科。邵大使甚赞斯大林伟大，说要是沙皇时代，苏联早就投降了。请过公民训育系主任王政（字子政，后到云南省任教育厅长）讲“婚姻问题”。他说：“选择配偶一定要注意对方身体健康。我的太太同我在美国留学多年，互相接近谈恋爱，回

国结婚后，身体不好，一年到头药罐不离(指吃中药需要药罐煮熟)，给我带来了许多麻烦，家庭幸福也谈不上。”记得当时他说：“世界上绝无理想的配偶，只要两人在观点上求大同存小异就可以了。而且婚后两人要互谅互助，才能建立美好而幸福的家庭。依我看，男人最好同刚刚失去丈夫的寡妇结婚为好。因为她深感失去丈夫的悲痛而十分珍爱着你。漂亮固然好，内涵更重要。”请过郭沫若到沙坪坝“学生公社”礼堂讲演。他讲“离骚”，含沙射影抨击蒋中正不能采纳别人意见，刚愎自用、顽固不化的专制独裁统治。中大学生自治会(这时我已不担任主席)曾请东北籍国民参政员莫德惠到中大讲演“东北接受情况”，讲到长春市一条最大最长的街道被命名为斯大林大街，东北有可能被苏联侵占等语，激发了中大学生到重庆举行反苏大游行，打砸新华日报社、生活书店等胡闹一番。陈立夫也到中大讲演“关于人生观哲学问题”。

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期间，有一天，熊子容老师早饭后见到我说，“毛泽东先生来看我，因为在长沙师范学校授过他课的。”我说：“请毛先生对我们学生讲讲政治协商情况。”熊说：“我对他提到这点，他说：‘不需要，不需要啦。’”熊认为毛先生恐怕中大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会给他难堪或捣乱。熊先生送走毛先生以后，上过课(熊先生教我“教材教法”课)，熊对我说：“毛先生特别赞赏中大民主墙和大字报，连声说好，好极了。以后我们都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发扬民主么。”

(八)

撤销国民党中大区党部

国民党中央直属国立中央大学区党部(级别等同省党部，直属中央组织部领导，不属重庆市党部)党员不多(不到一千人不能成立特别党部)。我进中大时，中大区党部书记是黄如今(教育系教授)，后来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有可能倾向国民政府，遂电请重庆派人到新疆去筹建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并筹办新疆省高等学校。组织部长朱家骅即把黄如今调到新疆去任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兼办新疆师范学院(后来院长也由黄兼任)。这时区党部要改选，我正担任学生会主席，朱家骅想借我的力量选他要选的人。于是派学校党务科长杨西昆到中大找我要我参加执行委员竞选。我说：“我学习工作太忙，无意参选。”婉言拒绝不久，蒋校长来中大举行纪念周后找我谈话。蒋说：“你是最高学府学生会主席，理应参加中大党的竞选。”我说，“我兼职太多——师院同学会主席、中学校友会主席，系里班上都是我，实在忙不了。”蒋说：“职务多可委托他人代理嘛！我任中大校长就请朱经农代行我的职权。”我没有作声。不久，杨西昆又来找我，我同意参选。杨给我二十元活动费，我不要。杨说，“你找要好的党员同学助选时，可以请其到澡堂洗把澡，或到街上吃碗面条加强联系嘛！”杨把钱丢下就走了。我当时想蒋真细心，在百忙之中还想到中大竞选区党部执委，这在他来说是非常微小的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超俊到中大主持党员大会选举事宜。点票结果：周鸿经、唐培经、郭廷以、胡业仑、丁澍、余孝兹、龙任重等七人当选度为执行委员；霍清高、吴以祺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胡焕庸当选为监察委员。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上，周鸿经当选为书记。这时中大国民党员经登记发展，人数达五百八十余人。周鸿经到印度孟买大学讲学后，由郭廷以代理书记。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议撤销学校党务(郭廷以是参加代表大会的中大党代表)。郭廷以返校后，即把中大区党部的档案材料送给中央组织部。中大国民党员应到重庆市特别党部去报到参加活动。中大党员没有人到重庆报到，就这样不了了之。朱家骅在这次代表会上被免去组织部长职务，由陈立夫担任组织部长。朱家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周鸿经后来曾带领我们几位原执委到中研院去看慰。朱家骅显得有些失意样子，表示对陈立夫有意见。不久朱家骅又调任教育部长。周鸿经到教育部

任高等教育司长，严在宽任秘书，唐培经、郭廷以也都到教育部任司长了。中大毕业生到教育部工作的也就多起来了。

(九)

中大的社团组织情况

国民党中大区党部（书记周鸿经），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大分团部（干事长何义均），教授会（由中大教授、副教授、讲师组成的），助教会（由各系助教组成的）。沙坪坝学生公社（由中大学生组建的。我曾去过，当时中大政治系毕业生楚嵩秋在主持一切），中大学生自治会（由各系科代表组成的），中大松柏服务社（负责人朱丕生）。中大风云剧社（负责人杨艺林）。中大学生辅食部（由学生自治会在沙坪坝街上开设的饭店）。中大中国法学会（法律系组建的），中大中国教育学会（由教育系组建的），太公报社（负责人陈碧水、吴明培），正社（不公开活动，学生私下组建的，成员多为法学院同学，我到三年级时转入法学院政治系。第一任总干事是楚嵩秋，第二任总干事是胡业仑。社员人数最多时达到一百余人。后以中大复员南京，社员纷纷毕业离校，正社也就无形中解体了）。还有各省在中大组织的同乡会，各中学在中大组织的校友会。中大宪兵队（为保护蒋中正校长而进驻中大的，其他大学皆无）。各院有院会，各系有系会，各年级有级会。总之，我觉得中大校内情况很复杂。暗地里各派政治力量在中大也很活跃。中共地下党员也不少。我与之接近的有陈琏、笕绍基、李公天、李混泉（现名李迪晖）、焦伯荣（中大要开除他，由我说情，请吴有训校长免于开除，得以让他在中大历史系毕业），还有一些我现在记不起他们的姓名。据我估计，中共在中大地下党员约在三百人上下。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也有些特务在中大为非作歹。张君励领导的中国国家社会党，左舜生、曾琦领导的中国青年党，民盟、九三学社等党派组织都有人在中大活动。他们活动都不是公开的。

(十)

蒋介石任中央大学校长

蒋中正担任中大校长并不适宜。蒋中正担任中大校长就中大学生教师来说，认为并不适宜，但又不便公开反对。有一天，蒋中正对朱经农说，“某天请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及各院院长餐叙（请吃饭，就在教授食堂）。”结果各院院长均未到，蒋很不高兴地大声对朱经农说：“他们为什么不来，对我本人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嘛！”朱经农微笑着回答说，“他们对校长任国家最高领导人、最高统帅是拥护的，是伟大的、英明的。但就学术而言，似乎不太适宜。”蒋说：“我并不愿意担任中大校长，因为他们对前任校长有意见，又没有合适人选，所以我才来任中大校长的。这样吧，叫他们推荐人选，我来任命。”（这是我事后听说的）。

(十一)

蒋介石兼职过多

蒋中正呈陈立夫，陈立夫呈蒋中正，蒋中正呈蒋中正。这是同学们在一起开玩笑说的。当时蒋是中大校长、行政院长、国民政府主席。关于“学则”问题，由中大校长蒋中正呈请教育部长陈立夫审批，陈立夫转呈行政院长蒋中正审核，行政院长蒋中正再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核准颁布施行。这是同学们私下讽刺蒋兼职太多。

(十二)
中大历任校长

我报考中央大学时，中大校长是罗家伦。我入学时，中大校长是顾孟余，以后就是顾毓琇、蒋中正、吴有训（1946年6月，我就在吴校长任内毕业的）。南京解放前夕，教育部策划中大迁往台湾。吴有训校长及大部分师生员工表示不愿意迁校，吴校长遂离开中大。（解放后，吴有训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朱家骅呈请行政院任周鸿经为中大校长。周领了大量迁校经费飞到台湾去了。在中大师生中最受钦佩的校长就是吴有训，其次是罗家伦、顾孟余。

我今年杖朝有四，身体衰弱，老态龙钟，记忆力尤差。我所写的上面十二点难免有错误，甚至有些严重错误（人名、时间、地点、事实），敬请批评指正。

中央大学四六届政治系毕业生胡业仑